

郭廷以編

近代中國史

第一冊

近代中國史

第一冊

郭廷以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再版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近代中國史第一册

定價國幣拾伍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93252.1A)

編纂者 郭廷以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地商務印書館

聯

例言

一、歷史研究，應自史料入手。以近代中國史論，現在尚爲史料整理編訂時期，而非史書寫著時期。羅志希（家倫）先生已詳論之（見本書引論）。

二、本書編纂目的，在能於史料之整輯排比方面，盡其相當力量，爲後來史家做下若干預備工作。書仿長編體，亦近似西人之「讀本」（readings），又可稱之爲史料選錄或類輯，絕不以歷史著作自承。

三、治史以原料爲尙，本書所錄，大都出自官書及當事人記載，必不得已，始一用副料。

四、爲使各種分立不同之記載互相聯通，使讀者於各史事易獲得一貫明瞭之認識，編者於每個題目均略予簡要說明解釋。此種解說，有時常酌採西籍，並使其自成體系，但決不輕加論斷，妄發評議。

五、西文專名譯漢，以採用前人已有的定名或通行者爲主，非不得已，不別創新譯。

六、本卷紀事年代月日，以西曆爲主，並附以中曆，徵引典籍，則於中曆之下，註明西曆。

七、本卷敘事，始於十六世紀葡人東航，至十九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專利權之廢止，爲期約三百年。

八、本卷所記中西關係，以政治商業爲主，至於宗教學術，將於另卷記中西文化關係時述之，以明系統。

九、全書計畫，約分爲十九卷（至清末），草定於民國十七年。民國十九年秋本卷著手編纂，二十一年秋初稿完成，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又增改三次，先後由中央政治學校及中央大學排印，作近代中國史班學生參考，此次印行之稿，係二十七年所修正者。

十、編者另有近代中國大事誌一書，與此書爲姊妹篇，其中記事，有時可補此書所不及，讀者可互相參證（「大事誌」已全部完成，自十六世紀中西關係起，以訖於今，曾由中央大學油印，不久可望刊行）。

十一、本卷徵引及參考之中西書籍，其內容版本，著者事跡，原擬各予評釋註說，以明其性質，入川之後，以稽查不易，未克如願，讀者諒之。至是項書籍，除編者自有者外，大都假自中央大學、清華大學、金陵大學、政治學校、北平圖書館、南京國學圖書館及羅志希先生。

十二、編者研習史學，柳翼謀（詒徵）徐養秋（則陵）兩先生首啓迪之，而專力於近代中國歷史，則實受羅志希先生之教誨，本書之編輯，所得羅先生之指導協助尤多。蔣廷黻先生於近代中國史之科學研究，實與羅先生同開其風氣，直接間接，編者亦受其相當影響。謹於此一併誌謝於諸先生。

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五日郭廷以識於重慶中央大學石門村一號，時渝市慘遭轟炸後之翌日

引論

——羅志希先生：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

真實的時間和空間相合而構成『事』(event)。事和事是互相推動，互相影響的，所以無論什麼事都有歷史。事之中以人事最爲複雜，最爲靈動，最有趣味，而且關係人類的生活也最大，所以研究人事歷史的需要也最切。至於史書，不過是這種人事歷史研究過後，史學家認爲值得記載的記載。

因爲事與事間的推動和影響，常有交互聯系的軸紐(axis)一切事物如此，人事更是如此——所以歷史有各種的組合，各種的集團。如人事歷史的研究，就其所處地域來分，便有所謂國別史等等；就其所發生的時間次序來分，便有所謂通史斷代史等等；就其某項事的組合的重要性來分，便有研究專題的史，如文化史、經濟史、某次戰史等等。這都是就研究的便利，和謀研究對象易於專精而劃分的。

人事間相互的推動和影響，也和自然界受動力的支配一樣，愈近的力量愈大。用一個粗率的譬方來說，好像水中拋了一個石子，最近的圈子所受的推動最大，愈遠愈淡下去了（這還是從內心看到外邊去，其實應當反過來看）。所以最近人事的歷史，影響於人類，或是人類的某一部分——民族——也最大。要知人類或民族過去的來歷和演進，現在的地位和環境，以及他將來的生存和發展，都非研究他近代的歷史不可。這不是說遠的古的不要研究，或是研究了也不重要，

乃是說近的切的更當研究，尤爲重要。所以做近代的人，必須研究近代史；做中國近代的人，更須研究中國近代史。

說到時間空間的本質，原來是不可以割裂的。所以歷史有兩個特性：一個是連續性；一個是交互性。近代史的名稱，也不過是就研究便利而劃分的一個段落。就歷史的連續性而論，不是說近代是一個特殊的時代，可以不問過去一切的。如西洋近代，有許多西洋史家祇從法蘭西大革命講起。這不是說法蘭西大革命以前，西洋就沒有文物制度。也不是說法蘭西大革命一起，西洋的文物制度，一齊變了。巴斯梯陷落的日子，不能把全法國的公雞變成母雞。文物制度的變更，雖不能拏這話來做極端的形容，但是要把他一旦變了，其困難和不可能，也差不多是和公雞變母雞同樣罷。須知巴斯梯陷落以後，法國人還是照樣的生活，照樣的起居，不過史學家爲研究便利，和認定這件事對於某方面的重要性起見，姑且把它做一個重要時代的開始。若是把中國近代史從「鴉片戰爭」講起，也不是說近代的中國，就始於「鴉片戰爭」。別的不說，卽就中國對於西洋交通一事而論，也不是從這個戰爭開始的。近之如十六世紀中西海路交通，如方濟各利瑪竇的東來，和西洋文化與商品的輸入：遠之如中西當漢唐時代在中央亞細亞的交通，和中國由西北所受希臘與亞刺伯文化的影響，那一件不應當提到。「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不能真正閉關：海禁大開，也祇能注重這個大字便了。如果史學家從「鴉片戰爭」開始講中國近代史，也不過是爲研究便利，和認定這件事對於中西短兵相接後，所發生的各種影響的重要性起見，把它當作一個重要時期的開始而已。原不是認爲這個時代，可以和以前的一切歷史分開的。

就歷史的交互性而論，則中國近代史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而且是一個最有趣味的對象。我方纔說過，中國和西洋的接觸，並不從最近開始；但是在最近一段裏，中國確是和西洋一天一天的增加了許多國際的關係，發生了許多深刻的影響。不祇是軍事、經濟，和所謂一切物質文明，因此發展了新的局勢，而且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和文明基礎，也因此受了劇烈的震動和變更。現在沒有幾件中國的事實，是可以離開世界的環境講得通的。要研究中國政治的改革和變動，非打通國際的情形來看不可；要研究社會的改變和生活，非綜合他國的現象來看不可；要研究文化的演進，非考察世界的學術思想不可。從具體的一件軍事來講，譬如英法聯軍戰爭一役，英軍因亞羅號事件已於一八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起，開始軍事行動，攻下礮臺，礮擊兩廣總督衙門了，到一八五七年全年幾乎戰爭中止，大家都很莫名其妙：葉名琛則相信扶乩，乩仙說過了那年陰曆八月十五日英軍不來，則不再來，那知中止的原因是因爲一八五七年五月十三日的印度叛變，英國大使額爾金(E. P. Galt)把英國調來的兵，在中途——新加坡——轉調到印度平亂去了。到該年年底，印亂已平，英兵來華，於十二月二十九日與法國合兵攻下廣州；於一八五八年一月四日葉名琛被俘。設如不打通世界大勢來講，則戰事中斷一事，如何可以講得通？設如印亂不平，英兵始終不來，則葉名琛的乩仙——豈不真是千靈萬靈有退兵之術嗎？若是從大家可以看得見的方面來講，則在這個時期之內，發生了五個重大的對外戰爭：鴉片戰爭（公元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英法聯軍戰爭（一八五六至一八六〇年）、中法戰爭（一八八四至一八八五年）、中日戰爭（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八國聯軍戰爭（一九〇〇年）——那一個不是和外國直接的衝突，那一

次衝突不在外國內發生重大的影響？還有兩次大革命——一次是太平天國革命，一次是辛亥革命——至於思想革命，和國民革命，還正在繼續進行，沒有停止。所以這個時期，實在經驗了互古未有的大變。我們無論是對於歷史的真象負責，無論是對於民族生存的適應負責，能够不研究嗎？

研究中國近代史是實際的需要，也是知識的要求；但是中國現在看重這種研究的很少，——當然，帶營業性的中國近代史出版品也很多，學術界卻不能認為研究，——這也有些緣故。第一是因為學者的好古心，覺得材料愈古的愈可尊重。（不可一概而論，有許多真正的古史學家，並不忽視近代史的重要）。第二是因為恐怕時代愈近，個人的好惡愈難避免，深怕不能成為信史。第三是因為恐怕有許多材料不能公開，將來發見，以後他人再來重寫，自己的著作不能成為定史。其實這三點都不能成為不研究近代史的理由。第一、從學術的眼光看去，什麼材料，都應當平等看待。古代的殘磚斷碣，對於歷史的重要，不見得就高於近代的告示公文。我們不能因為他難得而重視，更不能因為他常見而鄙棄。須知今日的告示公文，若是保留到幾千年後，將來史學家何曾不是把他當作巴比倫的殘磚，埃及的古碣，或是『流沙墮簡』，一樣的重視，加以冥思暗索呢？同是史料，愈其等將來稀少的時候，再來視如拱璧，何如當現在多的時候，予以較大比較研究的機會呢？史蹟重在親見。從前司馬遷研究孔子，自己說：『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低徊留之，不能去焉。』司馬遷這種實地考察的精神，非常可佩。但是可惜他所看見的，還不過是漢朝孔子廟堂裏的車服禮器，設如他能看見孔子時代的車服禮器，豈不更

好嗎？還有許多實際的情形，是要靠當代人口述的。章實齋說：『余修永清縣志，親詢鄉婦委曲』。設如時代湮遠，生活態度改變，章實齋又何從得鄉婦而親詢？第二、因時代太近，恐怕牽涉自己的好惡，的確是一件可顧慮的事。史學家重在客觀，不能以主見來影響事實的眞象。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也是史學家一個重要的信條（但是史學家對於史料的選擇，和史事的了解，自有標準。史事被史學家了解的時候，已自成一軸紐。這個道理，和我在本文頭幾段所說的道理，當另有一文討論）。『不識廬山眞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這話是近代史學家應該刻記在心裏的。但是卻不能因噎廢食。孔子是最明白這道理的人，所以他作了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其中有七十三年，便是他自己經歷的時代。司馬遷做史記，不在漢武帝以前停止。再舉西洋的史學家來說罷，西洋史學家的父親 Herodotus 所記，便是他從埃及等處親自見聞得來的。希臘大史家 Thucydides 是親自參與 Poloponnesian 戰役的人，但是他寫的 Poloponnesian 戰史，是一部很可靠而『不廢江河萬古流』的著作。就我個人的經驗而論，關於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克復泰安的戰役，據總司令部致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軍事報告說是四月二十七日克復的（見報告第五十七頁）。但是我於五月一日過泰安，看見泰安城上，還是褚玉璞的兵，設如後來發現任何人在泰安圍城中的日記，便要起爭論了。因爲負責的機關長官，向負責的會議的報告，一定是很可靠的，而且就情形而論，那次戰爭早經結束，對於一個城克復的遲早，斷無早報以誇張武功之可言。但是圍城中被難人的日記，也是很可靠的。這個官司，也許後人引經據典爭個不了。那知事實是那次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戰役，往往把敵人包圍在城裏，不等城池攻破，卽已

前進，泰安的情形，也是如此。而執筆寫報告的人，以為軍隊已過泰安，即算克復泰安。這個疑團，是我親到泰安城下，目擊情形，纔能解決的。又如報紙或定期刊物，也是一種重要的史料。研究『鴉片戰爭』的人，不能不參考當時廣州英國人出版的定期刊物，共二百四十號，名叫『Chinese Repository』，這是一種重要的史料；但是這祇是英人的記載。當時中文還沒有報紙，可使供我們的比較。現在上海字林西報對於中國，特別是對於中英關係問題的記載，我們就知道如何比較考核了。就以中國現在的報紙而論，言論記載，各有不同；我們天天看各種重要報紙，而且知道各種報紙的背景，所以能夠知道各報紙所載事實的真相。若是等到千百年後，各報之中祇有一種是保存全部的，而且他的背景，——甚至於某年某月一段時期的背景，——後來的史學家無從知道，祇根據他的記載來做史料，來下判斷，豈不是大大的上當嗎？第三、說到許多文件不能公開，的確是史學家一件憾事。寫史書的人，誰不願意把所有在他研究範圍以內的材料，通通看見，成一種名山不朽的著作。但是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在搜集可能範圍以內的材料，未始不可供史學家畢身精細的工作之用；而且不能公開的材料，除一小部分外交政治的祕密而外，其他的還是汗牛充棟。況且歷史的著作，並不限於外交政治祕密的方面。即就外交政治祕密的材料而論，也不是絕對不公開的，雖然常有年度的限制，（但是當年我承友人的介紹，到法國外交部去看有關中國問題的檔案，也開放到一八六〇年為止，至於他們本國人和政府有接洽的，當然看到的期間更遲，如 G. P. Gooch 寫大英外交史便參考過英國外交部最近的材料；而 H. B. Morse 寫『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也看過英國外交部關於鴉

片戰爭的檔案)。並且謝俄國的革命，把以前帝俄的祕密文件，一齊發表，或是公開出來。他們『紅檔』裏面，不但有許多是關於西洋外交史的材料，而且有許多是關於中國內政外交極重要的材料（現在外交檔案全部不公開的，恐怕只有日本，這件事很受西洋學者的非難）。大戰以後有許多條約，也祇是公開的祕密。如威爾遜文件的發表，Col. House文件的發表，還有許多自傳、回想錄的發表，都是留心的史學家最好取材的寶藏。就以中國近代史而論，除了民間社會的材料而外，就是政府的文件，最大部分也是公開的。如『內閣大庫檔案』、『軍機處檔案』等等，都分藏在故宮博物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北京大學等處，可以自由參考。從總理衙門、外交部一貫下來的檔案，都有鈔檔可以調閱。況且中國的外交內政，簡直沒有多少的祕密可言。至於說到史書的定本一層，那就更難說了。老實說，史書就是永久不能有最後定本的。古代史的標準著作，常常因新的發現，新的探掘，而有變更，如殷墟的發掘，便變更了許多我們對於殷代文化制度和世系的觀念，值得我們重寫一部殷代史。就是沒有新的發現，則因後來的生活愈益演進，對於前代的了解自然愈益增加，並且愈有不同的觀點（這個道理，我也在另文研究）。知識的探討如果一日不停止，則誰敢說他的著作，是最後的一部呢？

比較起來，『文獻足徵』，而且『所見異詞』優於『所聞異詞』，是研究近代史所佔最重要的優勢。在目前的不研究，難道等到將來湮沒以後，對荒邱而太息嗎？所以我覺得在國外受過近代史學訓練的人，應當積極研究本國史，或是本國近代史。我不是說中國人聰明才力，盡心去研究外國史，不能和外國史學家權威抗衡，乃是說除非他能終老於外國，不然即以材料的不方便而

論，要與外國對於史料予取予求，終日靡娑的學者，去爭一日之短長，或是百年之大業，是很難的。並且學術的眼光，是把一切材料都作平等待遇的，不見得遠方來的藥材，便是靈些。又何必舍近就遠，舍己耘人呢？

近代史的文獻雖然多，——不祇是文獻，就是實際的物件等等也是多，——但是喪失的快，也是可以驚人的。「鴉片戰爭」時所用的噴筒，——當時重要的火器，——至今我不過在南京第一公園裏，看見一個。庚子戰役時的武器、旂幟、告示，以及民間所貼的『花紙』，祇有外國的博物院和圖書館裏，還可看見。就是辛亥時候的報紙雜誌，現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四處登報招求，已經有許多是不可再得的了。建築雕刻最近被毀於水火兵災的，更是不可勝數。這種文物的淪亡，是極可傷心的事。如實際的物件等等之保存，祇有靠國家或是大規模團體的力量，和一般人民的歷史興趣。如國立歷史博物館，是亟亟於要建築的。至於檔案一層，更非靠國家的力量不可。如英國的 Public Record Office 是一種最好的制度，但是中國還沒有談到。十七年國民革命軍進北平的時候，我眼見各部檔案散失，並且想了許多法子去挽救；雖然不無一時的效果，但是終因範圍太大，機關太多，卒致束手。我曾經建議設立檔案保管局，也因為財政困難，不能實現。從研究史學的人看去，是多麼可以痛心的事！有如太平天國的文件，當時因觸犯禁忌，幾乎全部消毀掉了。在國內除故宮博物院裏略有發現而外，我想太平天國滅亡以後，兩江總督衙門和布政司衙門裏，一定還有存着的。但是我訪求了二三年，知道經過迭次的兵災，完全喪失。英法聯軍戰爭以前，中國的外交中心是兩廣總督，但是兩廣總督衙門的檔案，在一八五八年廣州失守

的時候，大部分喪失，一小部分被擄到歐洲去了。祇落得我在歐洲的時候，還在舊書攤上，買回一百多件（其中有一件是葡萄牙駐澳門理事官諉嚙，關於禁煙問題，向林則徐具的甘結，有親筆簽字和火漆印章）。國內總理衙門及以後外交機關的檔案，卻有二萬多本的鈔檔；雖因拆訂一部分，弄得很凌亂，但已經是最難能可貴的了（至於原檔，已經凌亂損壞散失不堪。譬如十八和十九兩年，我去研究中日戰爭檔案的時候，想調閱李鴻章和俄國所訂中俄密約的原文，登記簿子上說是存在一小皮箱裏；據一個從外務部到外交部服務將三十年的職員說：此項密約原文和這個箱子早已不見，當華盛頓會議的時候，與會的國家，要求中國發表原約，但是徧尋不得，後來一個不重要的職員，在地下的亂紙堆中發現出來，現在原件又不知去向。華盛頓會議的記錄上所載的是否係原文，抑係譯本，亦不得知，真是可惜）。如袁世凱的時代國務院的公文信件，我爲清華大學圖書館論斤的買了許多，燕京大學也買了不少。可見其餘機關檔案散失的情形，真是一幕慘劇！若不積極保存，將來更不知道散失到了若何地步。

國家的檔案，當然主要的還祇有靠國家保存；但是在國家的力量和當局的認識，還沒有到這問題來的時候，各處圖書館應當盡他充分的力量；而史學家的尋訪搜集，也是一件極重要的事。雖然不能和國家去全部保存的那樣痛快，卻也是一個不小的力量。『世上無難事。祇怕有心人』；『千仞之岡，始於培塿，九達之衢，肇於跬步』；恐怕要成尋訪搜集史料者的格言。尋訪搜集以後，還要繼之以整理，考訂，發表。其實什麼是歷史研究法？嚴格的講，歷史研究法祇是史料研究法。德文所謂『阿瑞斯踢克』（Hermistik）的學問，正是搜集史料的學問。發表一層，也很重

要。雖然不能全部發表，不能不有精密的選擇，選擇標準一層，自不能不起爭論，但是爲自己和後人的運用，以及將來的流傳起見，這種困難，是不能免的。在寫史書以前，史料叢書的編訂，是必經的階級，如德國的‘*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英國的‘*Rolls Series*’，和法國的‘*Collection des Documents inedit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正是這一類的重要貢獻，最近德國的‘*Die Grosse Politik*’，也是一個史料的寶藏。中國以前的『長編』，也髣髴有同樣的性質。所以章實齋於史料整理的意見。說是理宜先作長編。長編既定，及至纂輯之時，刪繁就簡，考訂易於爲功（參看章氏遺書卷十三）。章氏論史，以『記註』與『撰述』並重，因爲名詞的用法不同，他所謂史學，祇限於史書。他說，『整輯排比爲史纂，參互搜討爲史考』。但是史纂史考乃是達到精確的史學所必經的階梯，所以他說，『史之爲道也。文士雅言，與胥吏簿譜，皆不可用，然捨此二者，無所以爲史也』（參看章氏文史通義，此處所謂史係指史書本身而言）。可見這種認識，是中國從前的學者有過的。爲求中國有科學的史學和精確的史書起見，史料叢書的編訂，實在是基本的工作，而且是刻不容緩的工作。將所有的史料一齊發表，固不可能，而且不必。但是將其有重要性的下一番『整輯排比』，或是『參互搜討』的功夫，實在是新史學的基本建設。若是真有重要的史料，能得其完整的更好，萬一不是完整的，也不當遺而不收。『吾猶及史之闕文』，豈不也是一件可幸的事嗎？

近年來中國很有人注重歷史研究法。這雖然是一種很好的現象，但是高談方法而不去做實際應用方法的工作，是不成的，讀一百部科學方法論，決不能產生一個大科學家，或是一個重要的

科學貢獻；讀一百部歷史研究法，決不能產生一個大史學家，或是一部重要歷史的著作。大科學家 and 重要的科學貢獻，是從實驗室裏，繁瑣而極費耐心的工作裏，產生出來的；大史學家是從史料的灰堆和凌亂的文件裏產生出來的。「大匠能授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巧是一切發明貢獻的基本條件。巧是從運用一部分確定範圍以內的材料到精熟的程度，纔能產生的。現在西洋大部分的史學家，真所謂「席豐履厚」，有人已經替他們做過了搜尋整理的工作（但是研究西洋中古史的人，便不見得有這種的福氣，還有許多「銀拉了」的材料，非自己整理不可的），在中國的史學家便不能袖手旁觀，要有自己的工作，非自己下手不可了。

再限定範圍來講。我覺得現在動手寫中國近代史，還不到時間，要有科學的中國近代史，——無論起於任何時代，——非先有中國近代史料叢書的編訂不可。所以若是我在中國近世方面要作任何工作的話，我便認定從編訂中國近代史料叢書下手。這件事我不問自己的力量薄弱如何，確有具體的計劃。材料的搜集，自當隨地留心。材料的編纂，也有確定的分類方法。因為材料不是全部可以收齊，所以祇能隨得隨編，不能問年代的順序，或是事件的先後。不望在短期有大批的發表，祇望能夠持之以恆，做一種日積月累的工作。因為公家的機關常有變動，往往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為持久計，所以常想借重商業出版機關。這件事當然不是一手一足之烈，所以更渴望國內有志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人，隨時予以幫助。我所謂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方法，主要的部分，就是整理中國近代史料的方法。

要整理浩瀚而且零亂的中國近代史料，來編成叢書，我以為應當分成三大部分，可以稱為

「類」。以下再分爲「編」。

第一類便是中國文的史料。研究中國史，當然中國的材料，是最重要的部分。外國「漢學家」研究中國史不能及中國學者的地方，就是中國學者運用中國材料，比較便利，比較豐富。如 H. B. Morse 雖然參考了許多西洋的材料，但是對於中國材料，便無法用以佐證。無論他如何精細，但是他運用的材料，祇是他看見一件事的半邊。而中國人則除看中國材料而外，還能通外國文字的也很多，本來大可有爲，祇是棄而不用罷了。中國史料，大致可以分爲以下幾部分：

(一) 檔案 除了散失而外，所存檔案，還是浩如煙海。即就當年中央政府的檔案而論，則軍機處和內閣大庫的檔案，存在故宮博物院所屬的大高殿，和歷史語言研究所與北京大學的圖書館裏的，已經充棟，運起來一定可以汗牛；其中有許多是沒有發表過的。近年如故宮博物院刊印夷務始末和各種定期刊物，與歷史語言研究所刊印明清史料等書，都是很有價值的工作。留中的密摺，故宮博物院也有過刊印的提議，希望能夠早日實現。這種大規模的刊印當然祇有希望這幾個主管機關辦理；但是散失在外的檔案，如我在歐洲所得兩廣總督衙門的檔案，未始不可印行。最近林璧子先生刊印林則徐信及錄，也是禁煙的重要檔案。許地山先生從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鈔回刊印達衷集，乃是一種公私混合的檔案（當許先生在牛津讀書的時候，我到牛津去搜集史料，和他在圖書館同發現這部書，因爲他也是很有歷史興趣的人，所以我極力勸他鈔回。他鈔寫的方法，和他囑咐排印的款式都極好，若是可能的話，其他史料的印行可以取法）。研究檔案，自然也要批評的眼光。蒙混「聖上」「睿鑒」的奏摺，亦屬不免；但是關於年代時期等項，檔案比